

第四章 重慶的霹靂行動

第一節、租界行政權的保衛戰

一八四三年清政府因為鴉片戰爭失敗被迫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該條約制訂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規定在上海設立租界，一八四五年英人於上海劃界，英租界出現在上海。而美國及法國於一八四五年分別與清政府訂約後，也在上海劃出美租界與法租界，一八六二年英美兩國租界合併，稱為公共租界，上海即形成兩個租界即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格局¹。公共租界的行政機關稱「工部局」，其組織系統為「納稅西人會」及「納稅華人會」，二會下設董事會，由董事會下設各項事業的委員會，治理租界各項政務，兩個「納稅會」每年四月間開大會一次，討論預算決算以及征收捐錢等事，同時亦改選董事，參選董事的資格為每年納稅要到五十兩銀子，或房租能付到一千五百兩者。公共租界內居民各國人皆有，故董事會中之董事亦具有一種國際性²，「納稅西人會」之西人董事原由英美德三國人選舉組成，歐戰後德人席次由日人取代，「納稅華人會」則由華人選舉董事組成。總計董事會中英董及華董各佔五名，美董及日董各佔二名³。

雖然國民政府此時已遷至重慶，但上海仍留有一些政府機構，租界內的「納稅華人會」及特區法院仍由遠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掌控著，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汪精衛來到上海進行著新政府的成立工作，為了與重慶爭奪正統，對於租界中原由重慶掌控的各項行政資源勢必要接收為己有，況且重慶的特工人員靠著租界的掩護對汪日人員及機關造成莫大威脅，日本方面亦早想染指租界，於是汪日乃與重慶在「工部局」內部進行了一場租界行政權的爭奪戰。

一、華董改選、寧渝角力

對於租界行政權方面，雙方主要圍繞在工部局「納稅華人會」華人董事人事權的爭奪，「納稅華人會」每年春天照例須改選，汪日即抓緊這個時機展開奪權，最激烈者為民國二十九年及三十年春的兩次改選，「納稅華人會」共有五名華人董事，一直是聽命於重慶政府，但自從汪政府成立後就不斷對工部局施壓，企圖由重慶手中奪取華董的任命權。重慶在這場權益保衛戰中主要由組織部部長朱家驊及外交部長王寵惠、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世杰⁴、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⁵

¹ 王立民，《上海租界法制史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頁1。

² 吳圳義，《上海租界問題》，（台北：正中書局，民國70年2月），頁141~142。

³ 吳圳義，《上海租界問題》，（台北：正中書局，民國70年2月），頁143。

⁴ 王世杰，字雪艇，一八九一年生，湖北崇陽人，曾參加辛亥革命，民國初年留學英、法兩國，分獲政治經濟學士及法學博士，曾任國民政府法制局局長、湖北省教育廳長、立法委員，教育

等人奉蔣中正之命，指揮著上海地下工作人員吳開先、蔣伯誠、吳紹澍、馮有真等人，與日汪進行激烈之攻防。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六日重慶的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當時被派往擔任上海的地下工作領導人吳開先及蔣委員長駐滬代表蔣伯誠等人，拍了一封密電給國民黨組織部部長朱家驊及中央秘書處秘書長葉楚傖，該電稱上海「納稅華人會」之華董及華委又臨改選之期，歷年來董事會議於英美華三方合作下，日人一直無法插足，但這次選舉汪日決定挾金錢及威脅手段操縱選舉，加以原任華委周邦俊、張德欽及「稅會常務委員」汪曼雲等早已投汪，彼等對該會頗熟悉，現汪日決定除虞洽卿仍予連任外，其餘將以與日人合作之人員充任。吳、蔣擔心上海租界之工部局行政將為汪日所左右，果真如此則重慶在上海靠租界掩護之各地下機關將面臨被汪日消滅的危機，於是二人緊急請示重慶應該採何辦法⁶？由於當時「納稅華人會」仍由重慶掌控著，該會的華董及華委大都聽命於重慶，二月十九日吳開先曾向重慶提出應付辦法，吳建議以不改選來阻止汪日的企圖，他認為重慶可以用「經濟部工商團體停止改選辦法」之規定來應付，先由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外交部分別電致「納稅會」以抗戰期間各項選舉不易辦理，指示該會全體代表及華董、華委等在抗戰期間均不必改選，再聯絡原任各代表聯名提案請大會不必改選⁷。重慶覆電決定採納其辦法，於是吳開先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委吳紹澍分訪虞洽卿、林康侯、徐寄廎、奚玉書等諸華董華委，請其聯名提請大會停止改選⁸。三月中旬，重慶外交部長王寵惠電「納稅華人會」請其遵照「非常時期農工商團體維持現狀暫行辦法」之規定，延期改選，該會原任各代表准許其連任一年⁹。

面臨汪日來勢洶洶，「納稅華人會」也向重慶表達支持的立場，三月十八日上海「納稅華人會」領袖虞洽卿親電重慶稱已與吳開先等商定，此次華董、華委不改選，華董皆支持重慶，無態度不明者¹⁰。為堅定虞洽卿等人支持重慶的意志，重慶於三月二十日由蔣中正致一嘉勉電，該電稱：「先生領袖名流，闡揚正義，

部長等，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民國七十年四月病逝。見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5)》，(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1年7月31日初版)，頁6~9。

⁵ 蕭同茲，湖南常寧人，一八九五年生，民國二十一年五月開始擔任中央通訊社社長。來台後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六十二年十一月因心臟病病逝台北。見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3)》，(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9年11月1日初版)，頁367~368。

⁶ 〈蔣伯誠、吳開先電楚公並轉驩公、立公—民國29年2月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六十函：納稅會華董改選問題。以下檔案資料皆出自同一函，不再贅引。

⁷ 〈吳開先電葉秘書長並轉孔院長、朱部長、陳部長—民國29年2月20日〉《朱家驊檔案》。

⁸ 〈吳開先電葉秘書長楚公、朱部長驩公—民國29年3月1日〉《朱家驊檔案》。

⁹ 〈王寵惠函朱家驊—民國29年3月15日〉《朱家驊檔案》。

¹⁰ 〈虞洽卿電朱家驊—民國29年3月18日〉《朱家驊檔案》。

夙所欽折，寇患未減，邪說披猖 勳共勉國難。」¹¹，終於汪日對英美之施壓無效，重慶停止改選華董之議獲得英美支持，四月份公共租界西董選舉，外人方面英美也獲得完全勝利，日方名額未獲增加，於是各國名額仍維持原來，英人五人、美人二人、日人二人、華人五人。華董方面經虞洽卿及江一平等人的努力，仍由原來親重慶之人員連任，對於這樣的結果汪日非常不滿意，甚至威脅即將封鎖租界¹²。汪日之失敗對於重慶極具意義，尤其使重慶的特工人員得以繼續靠著租界的掩護對汪日從事破壞及制裁的工作。然而雖然這次的改選汪日失敗了，但他們並未因此打消攫取租界之念頭，因為董事須每年改選一次，隔年的改選之期亦即民國三十年春，國際形勢已經轉變，法國已經投降德國，英國正陷於苦戰，形勢對日本有利，汪日乃又對該年公共租界的公董選舉施壓。

民國三十年三月華董又面臨改選，有了前一年的勝利經驗，重慶仍想以不改選應付，但汪政府派人不斷包圍華董要員虞洽卿，虞因商務關係與汪政府接觸漸多，虞之「三北輪船公司」租給日方輪船數艘運輸鐵砂，虞並與周佛海、丁默村、李士群等，酬酢過從甚密，三月十五日虞竟向汪方私下同意將原有五名親重慶之華董讓出二名予汪政府¹³。在汪日威脅利誘下，虞之意向顯已產生動搖，於是吳開先及蔣伯誠婉勸虞洽卿暫時離開上海，免為汪日所惑，虞遂於三月十七日離開上海前往香港¹⁴。

虞洽卿赴港造成其原對汪政府之承諾讓出兩名華董不能兌現，於是汪政府再施鐵腕，汪方對「納稅華人會」各代表實施威脅，令其連署簽名蓋章，主張重新選舉，三月二十六日汪方再以恐嚇函件分致「納稅華人會」主席徐寄廎¹⁵，秘書嚴諤聲及華董陳霆銳、奚玉書諸先生，恐嚇他們不得再阻撓「納稅會」之改選，且函件中各附子彈兩枚¹⁶。面對這種精神威脅，三月三十一日蔣中正再拍電慰勉「納稅會」被威脅諸人¹⁷。華董們既如此堅決支持重慶難以動搖，四月初，汪日方面再轉向工部局施壓，日方向工部局力爭增加華董名額，而汪政府亦要求參加，於是透過英美日三國領事開會討論後，初步決定反而是減少華董一名，但同

¹¹ 〈朱家驊電吳開先轉虞洽卿—民國 29 年 3 月 20 日〉《朱家驊檔案》。

¹² 〈蔣伯誠電葉秘書長、朱部長—民國 29 年 4 月 13 日〉《朱家驊檔案》。

¹³ 〈蔣伯誠電朱家驊—民國 30 年 4 月 7 日〉《朱家驊檔案》。

¹⁴ 〈蔣伯誠、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 30 年 3 月 21 日〉《朱家驊檔案》。

¹⁵ 徐寄廎，浙江永嘉人，一八八二年出生，曾赴日本留學，以後在江、浙等地銀行擔任重要職務，民國二十一年擔任中央銀行副總裁，「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徐擔任公共租界納稅華人會副主席。抗戰爆發後協助吳開先、蔣伯誠等人的工作，並為維護上海金融界利益奔走，相關事蹟見 朱鎮華，〈徐寄廎生平事蹟〉，《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60 輯，頁 121-125。

¹⁶ 〈蔣伯誠、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 30 年 3 月 26 日〉《朱家驊檔案》。

¹⁷ 〈侍從室擬致徐寄廎等一電—民國 30 年 3 月 31 日〉《朱家驊檔案》。

意將減少之名額讓於日方¹⁸。從工部局方面得到這樣的承諾後，汪日再將矛頭轉回華董們，汪方聲言親重慶的華董奚玉書、郭順及陳霆銳等人務必辭職，否則將予暗殺，於是郭順及陳霆銳被迫離滬赴港暫避，二人赴港後，一不作二不休，汪方再將「納稅華人會」秘書嚴諤聲之夫人綁架，聲言須嚴諤聲表示對納稅會事不再阻撓否則絕不釋放，且將隨時拘捕嚴諤聲本人。汪日打的如意算盤是逼走郭順及陳霆銳二人後，擬請工部局於華董內補充汪所指定之人員擔任，若成功後即將進一步於工部局內推動公共租界內流通汪政府錢幣「中儲券」，檢查抗日之新聞及任用日人為總巡等計謀，如此可望對租界行政產生更大之影響力¹⁹。

二、各保兩席、權益均分

由於日方壓力不斷，四月一日工部局會辦何德奎訪問吳開先、蔣伯誠等，何轉述美國董事之意見稱此次若日方董事名額不由二席增至三席，則恐產生流血事件，故工部局決定由英美大使館商請重慶外交部，將原有五席之華董減少一席，如此則中日雙方總票數仍不致超過英美總票數，俾將來即使華董全被汪日所控制，工部局將來之行政，仍不致為日方所操縱。對於何德奎慷他人之慨以解除自己危機的建議，吳、蔣二人當然不贊同，二人認為若答應將減少之華董一席讓給日方，豈不違背抗日之政策，此舉亦將招致汪政府攻擊為對英美外交之屈辱，且其他四名華董此後行將時時受到汪日之威脅，將來仍不免被汪日所控制，二人遂建議重慶由外交部密令「納稅華人會」，以中國在戰爭狀態中，中國國人對有日人參加之會議及任何場所，今後一律不准參加為理由，令各華董及華委對本屆工部局董事會議概不出席，並由外交部及「納稅華人會」轉致工部局備案。工部局有此根據即可向外宣佈不再改選華董，對汪日有說詞，不致為難²⁰。

四月四日吳紹澍及吳開先、蔣伯誠再獲消息，英美領事會議結果不止要將華董五人減少一人予日方，且將應汪方之請，在其餘四席華董中，除保留虞洽卿及袁履登二君外，剩下兩席亦將讓於汪方所提人選，汪方將以國民政府前財政部總稅務司長許建屏及滬西最大賭台「六國飯店」賭主潘三省二人補任華董，重慶研判英方會向汪日做此妥協，係英方想保持在日軍佔領下的上海英人財產，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交換條件。英方再向重慶提議使上海成為一國際市場，要求重慶與汪方在上海之政治人員及言論機關等全部撤離上海，以保持上海之獨立性。英方這樣的構想將使重慶在上海的工作，如教育、宣傳、金融等均將遭受極大打擊，重

¹⁸ 〈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30年4月2日〉《朱家驊檔案》。

¹⁹ 〈蔣伯誠、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30年4月2、3日〉《朱家驊檔案》。

²⁰ 〈蔣伯誠、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30年4月2日〉《朱家驊檔案》。

慶當然無法答應²¹。

進入四月中旬，汪日再想出一條對策，他們壓迫工部局將華董人選改由工部局決定，美國董事將該建議探詢重慶代表意見，重慶的答覆是華董可以減少一名，但是餘四名華董必須全忠於重慶，重慶且擺出強硬的態度告訴美方人員，若由工部局決定人選或者將四席華董中的兩席讓於汪方，則將嚴重傷害中國情感。對於重慶的態度英美領事準備讓步，決定人選仍由原來之「納稅華人會」推薦，工部局也函請「納稅華人會」提送名單²²，重慶為顧全工部局立場，隨即對英美方希望減為四席華董之建議做出回應，重慶命令「納稅華人會」以正會長王曉籟及副會長徐寄廎名義提出四個華董名單，並發致工部局總董。該電稱「納稅華人會」原已依法選定民國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五名華董，該五名華董為虞洽卿、袁履登、奚玉書、郭順、陳霆銳，但顧及環境特殊及與「納稅西人」切實合作起見，本屆華董允暫推袁履登、奚玉書、郭順、陳霆銳四君²³，但因為擔心工部局再生變卦，四月十六日「納稅華人會」主席及副主席再致工部局總董一電，該電再次表明了重慶立場，向工部局鄭重聲明，一切假藉納稅會名義非法舉行之代表會選舉華董華委絕不承認，為了製造輿論支持，重慶並登報向所有租界納稅華人聲明同樣立場²⁴。

然而汪方早對接收工部局華人權益勢在必得，不達目的不可能罷休，他們派人將華董袁履登捕捉軟禁²⁵，且由袁處搜得工部局致「納稅華人會」要求提供華董華委名單之函件，汪方據該函件逕自舉行了一個「納稅華人會」選舉其華董，其中除保留親重慶的袁履登及奚玉書之外，再加上汪方人員許建屏、張德欽為華董，汪方再藉口因為「納稅華人會」正副主席王曉籟及徐寄廎當時都不在上海，所以改選虞洽卿及陳濟成擔任正副主席，遂仿照重慶向工部局提出該名單²⁶。收到重慶及汪政府的兩種不同華董人事版本後，英美日三國領事會商四小時，但意見分歧無共識，共分成三種意見，一為接受王曉籟及徐寄廎所提之重慶版本，二為接受汪方所提辦法，三則為四名華董中重慶及汪政府各佔兩名²⁷。面對越來越不利的形勢，重慶派出中央宣傳部上海特派員馮有真²⁸往訪英國領事，馮嚴正告

²¹ 〈蔣伯誠、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30年4月4日〉《朱家驊檔案》。

²² 〈馮有真電蕭社長並轉吳秘書長、朱部長、王部長—民國30年4月15日〉《朱家驊檔案》。

²³ 〈王世杰函朱家驊—民國30年4月15日〉《朱家驊檔案》。

²⁴ 〈王世杰函朱家驊—民國30年4月16日〉《朱家驊檔案》。

²⁵ 〈蔣伯誠等電蕭社長轉朱部長—民國30年4月15日〉《朱家驊檔案》。

²⁶ 〈蔣伯誠、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30年4月17日〉《朱家驊檔案》。

²⁷ 〈蔣伯誠等電朱家驊—民國30年4月18日〉《朱家驊檔案》。

²⁸ 馮有真，江蘇常熟人，民國前六年出生，之江大學文學士，抗戰時任中央宣傳部駐滬專員及

以「納稅華人會」允將華董減少一名，已屬絕大讓步，如華董中有一人爲所謂「附逆」份子，重慶絕對不能接受，且這樣的安排將來也勢必影響工部局英美自身之權益。處在順了姑意即逆了嫂意，兩邊爲難的公共租界工部局遂先將西董選出，而針對華董則一直懸而難決²⁹。然而汪方向工部局所提由虞洽卿擔任「納稅華人會」主席是有問題的，因爲虞洽卿早因汪方的壓迫由上海躲至香港，後更由香港來到重慶，接到這樣的消息重慶方面乃趕緊由朱家驊函請虞洽卿致電工部局澄清否認該事³⁰。

工部局終於做出最後決定，畢竟形勢比人強，處在汪日包圍下的英美租界勢力最終還是不得不對汪日低頭，四月十九日上海工部局「總董」凱自威電重慶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世杰，該電稱重慶所提四位華董中郭順及陳霆銳均因不在上海，故工部局已接受汪方所推薦之許建屏及張德欽遞補³¹。對於這樣不利的結果，重慶態度仍然堅持，外交部長王寵惠發表聲明否認工部局片面之決定，強調必須依照重慶的要求辦理，此外，重慶又密託英國駐華大使館向上海工部局施壓³²。然而重慶最後並未能挽回頹勢，最後華董名額仍由寧渝雙方各佔一半，重慶最終無法保持在工部局中的優勢，但一時重慶還不算損失太大，因爲汪精衛的勢力雖已滲入工部局，但是代表英美勢力的西董所佔名額仍多於華董，故汪方也不易施其翻雲覆雨手。重慶在工部局勢力之消褪是必然的結果，因爲日軍其實早晚都想攻入租界，以掌控整個大上海，更有效運用上海所有資源，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發生，日軍終於開入租界，英、美、重慶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勢力一起瓦解，但是在日軍開入租界以前，由於重慶對工部局華董人事權之掌控，對於掩護重慶破壞汪日的各項工作，應該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轉戰司法、攻防再起

汪政府在成功爭取公共租界工部局華董人事權之餘，其觸手也深入法租界及公共租界中仍由重慶國民政府管轄的「特區法院」，面對汪政府的步步侵逼，重慶的上海地下工作人員又與汪日展開了租界司法權的保衛戰。抗日戰爭前，國民政府與租界當局協議下，民國十九年四月在公共租界設有「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民國二十年八月在法租界設有「江蘇高等法院第

東南區專員、上海中央日報社長等，主持國民黨上海的秘密宣傳工作，民國三十七年飛機失事過世。國史館檔案 侍從室檔案 檔號 1000051208 馮有真。

²⁹ 〈蔣伯誠等電蕭社長並轉王部長、吳秘書長、朱部長—民國 30 年 4 月 18 日〉《朱家驊檔案》。

³⁰ 〈朱家驊致函虞洽卿—民國 30 年 4 月 18 日〉《朱家驊檔案》。

³¹ 〈王世杰函朱家驊—民國 30 年 4 月 19 日〉《朱家驊檔案》。

³² 〈王世杰函朱家驊—民國 30 年 4 月 19 日〉《朱家驊檔案》。

三分院」和「第二特區地方法院」，即在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各有一個高等法院分院及地方法院，特區法院的設立使國民政府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租界司法權³³。從民國二十七年春天開始汪日就同租界進行多方面交涉，要求把設在租界內的中國法院接收過來，由於英美法等國當時只承認重慶國民政府，故始終拒絕把法院交給他們。汪政府最後將爭奪租界法院的工作交由「七十六號」來執行，「七十六號」向法院人員寄了大批恐嚇信，要他們接受汪政府管轄，保證原職不動，否則就對他們執行死刑，租界當局不得不因此加強對法院人員的安全措施³⁴。

「七十六號」對租界中國法院人員使用兩面手法，一方面用重金引誘，給予津貼，進行拉攏。另一方面派人至法院投手榴彈威脅，但投彈威脅仍未使親重慶的司法人員屈服，於是「七十六號」就採取恐怖暗殺之手段³⁵。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七十六號」派暴徒襲擊租界之抗日報紙「中美日報」，事後有幾個特務被逮，公共租界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將之判刑，「七十六號」提出上訴並寫信給當時審理此案的「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長」（公共租界）刑庭庭長郁華，要他撤銷原判、宣告無罪，否則將對其本人不利，郁華將其上訴駁回並堅不改判³⁶。對於郁華不加入汪方的和運的不合作態度又與「七十六號」作對，於是汪方「特工總部」主任丁默村決定殺一隻雞給猴子看看。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郁華坐上車夫的包車要至法院辦公，不料突來一位二十餘歲之男子向郁華開槍，郁華倒臥在車廂中，車夫追兇手至浦石路口，見兇手躍登一輛汽車後逃回「七十六號」³⁷。

四、日佔租界、法院淪陷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重慶得到消息，汪政府已組織一個「接收委員會」，擬待意大利加入「軸心國」參戰後，由日意兩國發動要求各國駐上海之軍隊一律撤退，汪方再趁機以閃電攻勢及強制手段接收租界之法院及銀行，並對重慶地下工作人員執行搜查，接到這樣的不利消息，重慶立即由外交部擬定應付辦法³⁸，然而外國軍隊撤退上海之議卻遲遲無法實現。除了外交管道外，對於租界司法人員汪方仍繼續採取棒子與蘿蔔的兩面手法，七月汪方特工對公共租界司法人員又採取一

³³ 王立民，《上海租界法制史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頁75~76。

³⁴ 黃美真、姜義華、石源華，《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初版），頁80~81。以下簡稱《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

³⁵ 《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頁82。

³⁶ 《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頁82。

³⁷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海高等法院為郁華被害案訊問筆錄》，（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頁767~768。

³⁸ 〈吳開先電朱家驊—民國29年5月29日〉《朱家驊檔案》。

次殺雞儆猴的恐怖行動，公共租界「第一特區地方法院」刑庭庭長錢鴻業，因拒絕加入汪方的「法院同仁會」而被列為暗殺對象，錢由法院下班乘人力車回家途中遭「七十六號」暴徒槍擊，身中四彈死去³⁹。此舉使法院人員人心惶惶，同年九月「七十六號」發給公共租界第一特區地方法院一封信，該信稱抗日戰爭無希望，英美駐上海軍隊已無力行動，希望法院同仁在一星期內向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報到，否則將遭到報復，法官們驚嚇之餘都搬到法院住宿⁴⁰。到了十月汪方再使出利誘之手段，凡加入「法院同仁會」者皆可領到一筆津貼⁴¹。於是汪方陸續收買到「高三分院」之首席檢察官喬萬選及第二特區分院首席檢察官孫行康二人⁴²。十一月初形勢對重慶越來越不利，重慶得到消息法租界之法院將於五日首先被接收，若該法院果真被接收恐將對上海特工人員安危造成極大之威脅，於是重慶國民黨組織部長朱家驊指示吳開先等人，法租界法院已不能維持，幾天後恐將被接收，公共租界雖尚可勉強維持現狀，然局勢亦將日趨嚴重，朱轉告總裁蔣中正要吳等人若萬不得已時可以撤退。然而上海地下工作人員仍思挽救，十一月四日吳開先向重慶發電，該電稱法院問題關係全滬的重慶人員甚大，重慶之地下工作人員所受影響還不大，因為汪日要捕殺重慶特工早已不經租界法院，直接受害者為親重慶的律師、會計師及一般商人，故吳開先懇請重慶對剩下的「公共租界」法院務必設法維護⁴³。

十一月五日法租界兩法院被接收前，重慶仍圖最後努力，重慶的上海市黨部秘密發動法租界市民投函法國領事，請法方以市民安全為重，萬勿使法院被汪方接收，法領事遂以尚未得法國駐華大使指示為由，繼續命令捕房保護，且派出鐵甲車及大批武裝巡捕前往戒備。然而這僅是困獸之鬥，最後法方仍將法租界中的「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及「第二特區地方法院」交給汪政府，對於這樣的局面，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委吳紹澍等人除堅持留滬繼續與敵人周旋外，再請重慶提供已投汪且被重慶吊銷律師資格之人員名單，讓市民得以識別抵制⁴⁴。法租界兩法院被汪方攫走後，為了鼓勵不隨法院投汪之法務人員，重慶將彼等調派至公

³⁹ 陳麗鳳、毛黎娟，《上海抗日救亡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頁493。

⁴⁰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age 139~140。

⁴¹ 王建平，《七十六號窟主李士群：民國史上最醜陋的中國人》，（台北：韜略出版，民國85年一版），頁108。

⁴² 〈吳副部長開先電朱部長並轉居院長—民國29年10月26日〉《朱家驊檔案》。

⁴³ 〈吳副部長開先電朱部長駱公—民國29年11月4日〉《朱家驊檔案》。

⁴⁴ 〈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29年5月29日〉《朱家驊檔案》。

共租界所屬之「高二」、「特一」兩法院繼續任用⁴⁵。

法租界兩法院被接收後使得公共租界法官們陷入單獨對抗「七十六號」的苦局，民國三十年二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四時三十分，威海衛路的民事法庭被「七十六號」派人丟了三枚炸彈，所幸無人傷亡⁴⁶。此時法院內部也出現問題，二月二十四日蔣伯誠及吳開先電告重慶司法院長居正及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該電稱「特一區」法院院長郭雲觀，首席檢察官鄭英伯突然要求重慶給予米貼，理由是中央銀行及郵局等機構皆有該福利，公共租界法院要求比照辦理，二法院人員態度堅決，聲稱未達目的將有罷工之舉。蔣、吳等由情報消息得知根本是有人從內部在煽動，然二人亦感覺上海生活費用日益高漲，該法院低級職員們，生活頗為艱難，爲了不失民心，二人希望重慶能答應給予救濟⁴⁷。一個月過去了，重慶並未有回應，三月底事態緊急，吳、蔣再電催重慶司法院稱「特一區」兩法院之職員、警丁、看守等請求米貼急迫異常，兩法院長官雖不斷安撫，希望靜待命令，但未得效果，恐將形成罷工風潮。若重慶未能早日核准則可能會授予汪方攫取公共租界法院的可乘之機⁴⁸。爲免節外生枝，重慶司法院終於答應給予救濟⁴⁹。重慶雖解決了法院內部問題，但來自汪方的壓力仍未解除，三月四日，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長徐維震博士，在自家門口遭五名持槍男子綁架，法官馮世德的家也被手榴彈所炸，與此同時，第一特區地方法院院長、審判長、檢察長的安全都受到威脅，四月二十二日有兩位法官險遭綁架，於是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的辦公室變成宿舍，法院人員不敢拋頭露面，只好住在法院裡⁵⁰。

公共租界兩法院堅持到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終於發生，當日日軍即攻入公共租界並佔領兩法院，兩法院人員惶惶不知何往，多人於威脅下被迫投汪⁵¹。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二日汪政府行政司法部長趙毓松派人接收公共租界兩法院⁵²。法租界兩法院則早在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即已被汪方接收，但反而整個法租界遲至民國三十二年七月才被汪方接收，這是因爲法國滅亡後，新成立的法國「維琪政權」聽命於德國，故上海法租界成爲德國勢力範圍，所以太平洋戰爭雖爆發，

⁴⁵ 〈吳副部長開先吳紹澍馮有真電朱家驊—民國 29 年 11 月 18 日〉《朱家驊檔案》。

⁴⁶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ge 140。

⁴⁷ 〈蔣伯誠吳開先電朱部長並轉居院長覺生、謝部長冠生—民國 30 年 2 月 24 日〉《朱家驊檔案》。

⁴⁸ 〈蔣伯誠吳開先電朱部長並轉居院長、謝部長—民國 30 年 3 月 28 日收電〉《朱家驊檔案》。

⁴⁹ 〈居院長正函朱部長家驊—民國 30 年 3 月 27 日〉《朱家驊檔案》。

⁵⁰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ge 140。

⁵¹ 〈白電朱家驊—民國 30 年 12 月 29 日〉《朱家驊檔案》。

⁵² 《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頁 83。

日軍並未立即攻入法租界⁵³。然而遠在重慶的國民政府能保持公共租界兩法院至太平洋戰爭以後實屬不易，這中間重慶的地下工作人員對狀況的掌控，對法院人員的安撫功不可沒，試想若不是重慶掌握了司法裁判權，重慶地下工作人員將失去屏障及保護，所有上海淪陷區的地下組織恐均將遭致解體的命運，連帶也將使重慶勢力在上海無立足之地。這也是汪日想攫取租界控制權的原因，租界重慶地下工作人員對汪日造成的威脅甚大，汪日若能掌握租界司法權，進一步日憲兵及汪特工就能直接在租界逮捕重慶人員。民國二十九年二月日軍駐上海的「十三軍」曾有一「對上海租界的工作要領」，該要領提到要強化「越界築路」及臨近地區之特務工作，要增強租界內之憲兵及警察之力量，鎮壓重慶政府機關，接收特區法院，要使法租界與公共租界同樣可由日憲兵與工部局警察共同搜查⁵⁴。汪日後來果然取得與租界警察共同搜查之權，使重慶特工人員吃盡苦頭。

就租界中有關「納稅華人會」與法院的鬥爭而言，重慶延緩了汪政府對上海租界各項資源的掌控，使特工人員能於這段期間繼續監視汪政府行動，搜集其情報，打入其組織，這對戰爭後期策反汪方人員甚至掌控汪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重慶延緩汪日對租界行政權的控制於整個戰局仍有其正面作用，而太平洋戰爭發生後重慶雖然喪失租界所有資源，但是卻得到一個對戰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美國盟友。

⁵³王立民，《上海租界法制史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頁117~119。

⁵⁴〈朱家驊電吳開先—民國29年2月28日〉《朱家驊檔案》，第五十六函：蔣伯誠吳開先報告。